

阿瑞吉的经济社会学研究： 金融化与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

——兼评《漫长的 20 世纪》

王荣欣

一、导言

意大利社会学家乔万尼·阿瑞吉的三部曲《漫长的 20 世纪》(Arrighi, 1994)、《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阿瑞吉、西尔弗, 2006) 和《亚当·斯密在北京》(Arrighi, 2007) 对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是 1994 年出版的《漫长的 20 世纪》，他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霸权转移理论，即霸权依次经历了从热那亚（意大利）、荷兰、英国到美国的转移。根据他的判断，世界现在正在经历第四次霸权转移。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阿里吉, 2009) 中暗示，霸权正在从美国转移到东亚地区。金融化 (financialization) 已成为当下经济社会学的重要议题 (Krippner, 2012)，阿瑞吉是较早洞察到金融扩张将对现代社会形态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学家。

阿瑞吉 1937 年出生于米兰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2009 年因癌症病逝于美国。他早年曾执教于非洲的大学，研究非洲问题，对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南部非洲有过深入的研究，后来返回意大利，再辗转至美国，结识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成为世界体系理论研究者中的重要一员。阿瑞吉先后任教于世界体系理论的大本营纽约州立宾汉姆顿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在一篇题为《资本的蜿蜒之路》(Arrighi, 2009) 的访谈中（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的中文版（阿里吉, 2009）作为“代序”），阿瑞吉对自己的人生经历述之甚详。

身为社会学家，阿瑞吉对经济社会学曾有严厉的批评。他认为当代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范围过于微观，忽略了资本主义等重大议题，没有将资本主义当作“历史的

社会系统”，也忽略了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提出的解释框架（Arrighi, 2001）。国内对阿瑞吉著作的评介不多，对其思想的重要性普遍缺乏认识（戴雪丽，2014；王荣欣，2014；李博，2016）。实际上阿瑞吉的研究与当前一些最新研究议题具有极为紧密的关联，如当下的中美贸易摩擦，就可借助阿瑞吉的霸权转移理论理解。此外，金融化理论也与当代社会息息相关，金融市场的异常波动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深层原因也肇始于前一个经济阶段的金融化（即金融扩张）。

阿瑞吉从世界体系理论和宏观社会学的视角对经济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以及如何继承并发扬他的学术遗产，成为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将阿瑞吉的思想概括为“一体两翼”，“一体”是指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和对历史资本主义的分析，金融化和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两大核心理论则构成阿瑞吉思想的“两翼”。

二、阿瑞吉对新经济社会学的不满

经济社会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学分支，大致形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社会学界。经济社会学有新、旧之分，两者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在阿瑞吉看来，经济社会学的三大传统分别是德国的经济学的历史学派，韦伯、法国的圣西门工业社会和迪尔凯姆学派，以及美国的帕森斯和斯梅尔塞的“经济与社会”学派（Swedberg, 1991: 252）。其中，美国学派也可以称为“结构功能主义”的经济社会学与卡尔·波兰尼“实质主义”的经济社会学（Arrighi, 2001: 107）。人类学实质主义学派认为经济行为和社会关系密不可分，形式主义学派则与之相反，经济行为可以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帕森斯的“经济与社会”学派随后成为美国经济社会学的主流范式，强调经济是一种社会系统，但这一理论框架过于抽象，较难运用于实证研究。

20 世纪中叶以后，经济学和社会学加速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社会学基本采取守势和剩余策略，即经济学不予研究的领域才由社会学研究，比如家庭、贫困和犯罪等，两个学科暂时相安无事。但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崛起，以芝加哥大学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经济学家开始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传统上属于社会学的领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学界对经济社会学的关注度降低。此时开始社会学家也开始反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的问题。

学界追认 1985 年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

性问题》(Granovetter, 1985) 的发表为新经济社会学的出现标志。新经济社会学起于旧经济社会学之衰。新、旧经济社会学的共同之处在于旧经济社会学是对“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的回应，新经济社会学是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回应 (Arrighi, 2001: 108)。

新、旧经济社会学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新经济社会学更强调网络和嵌入性。新经济社会学是微观、社会互动的取向，旧经济社会学是宏观、社会系统的取向 (Arrighi, 2001: 108)。格兰诺维特给出的嵌入性的原意是：行为和制度都深受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的约束，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分析行为和制度 (Granovetter, 1985: 481)。通过嵌入性概念的引入，新经济社会学推进了社会学对经济现象的研究。但新经济社会学过于关注微观及中观层面的分析，而忽略了宏观分析。它抛弃了旧经济社会学的良好传统，没有将资本主义视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系统。这也是阿瑞吉对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不满。阿瑞吉对此的解决之道是引入对资本主义的宏观和历史分析，他为此提出两个重要概念：金融化和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并在这两大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分析。这既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发展及推进。

三、阿瑞吉经济社会学的“一体两翼”

(一) 发展社会学的历史之维

阿瑞吉早期所接触的世界体系理论主要在发展社会学领域。在发展社会学中，由于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不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后两种理论都可以算是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修正。

现代化理论认为只要对工业进行投资、采用现代技术，并结合竞争精神，发展中国家就能够踏上经济高增长之路 (Hardiman & Midgley, 1982: 52)。但是现代化理论完全建立在西方工业国家的成功经验上，忽视了经济增长的其他重要原因。依附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从生产的角度强调资本主义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将推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依附理论从贸易的角度突出了资本主义贸易发展所导致的地区不平等，并且随后成功地将现代化理论从发展

社会学中占据主导的地位赶下来，将关注点转移至国际不平等和不平等贸易。依附理论没有将“欠发达”视为原初、被动的状态，而将其视为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核心的”宗主国攫取了处于“边缘的”卫星国的财富。依附理论主要用于解释拉丁美洲国家的发展状况。世界体系理论则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其他地区和整个世界经济体系（Hardiman & Midgley, 1982: 55 – 56），是对依附理论的发展。沃勒斯坦在核心和边缘二分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半边缘的划分。世界体系理论内部的差异很大，阿瑞吉更喜欢的说法是“世界体系分析”，并对这套理论有所批评。他认为“世界体系的理论家越少采用核心边缘关系来解释一切，其分析则越具有可靠性”，沃勒斯坦根本没有解释欧洲的世界经济怎么会转变成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Arrighi, 1998: 121 – 122）。阿瑞吉由此开始自己的理论建构，从发展社会学走向了历史社会学。

（二）资本主义与金融化

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他的金融化理论。他将金融化定义为：从资本积累的物质扩张阶段进入金融扩张阶段，货币资本用于借贷和投机（Arrighi, 1994）。金融扩张超出了地域的限制，主要体现为资本的跨地域流动，这一定义的完整表述首见于《漫长的 20 世纪》，虽较为宽泛，但抓住了金融化的核心。该定义从历史演化的角度，同时结合时间和空间维度，拓展了金融化的时空范围，更接近于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当今以金融资本积累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已渗透到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杨典, 2018: 13），这些现象无不验证了阿瑞吉在三十年前的先见之明。

阿瑞吉写作《漫长的 20 世纪》的初衷是为了比较资本主义的三次危机。他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全球资本主义开始出现危机。阿瑞吉在《资本的蜿蜒之路》（Arrighi, 2009）中曾透露：《漫长的 20 世纪》最初是想同其妻贝弗里·西尔弗合著，并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写霸权，第二部分写资本，第三部分准备写劳工，包括劳工与资本的关系、劳工运动等。但在 1979 年，阿瑞吉进入宾汉姆顿大学成为费尔南德·布罗代尔中心的社会学教授，并对布罗代尔的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后，他很快就发现 19 世纪晚期的以金融资本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和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资本跨国流动、国家竞相吸引资本的全球化，都不是新鲜事物。于是，阿瑞吉在发现金融化是历史资本主义

的周期模式以后，对写作项目进行了调整，《漫长的 20 世纪》基本写的是 14 世纪以来，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布罗代尔观察到，意大利的城邦最早出现金融资本（Arrighi & Cleary, 2009: 124）。关于资本主义，布罗代尔提出三个观点：第一，从历史资本主义的“长时段”（即整个存在期）来看，它的本质特点是在不同时空下的“灵活不居”（flexibility）和“兼收并蓄”（eclecticism）。第二，金融领域才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家园”，而不是商业或工业领域。第三，与国家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市场），让资本主义在现代取得成功（Arrighi, 2001: 111）。资本和国家是相互渗透的。

布罗代尔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层次：底层的非经济、中间层的市场经济和最顶层的世界贸易。范围最广的底层是非常初级和自给自足的经济，布罗代尔称为物质生活。中间层是市场经济，体现为供给、需求和价格的自动协调。最顶层是反市场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真正家园”（Arrighi, 1994: 10）。中间层的市场经济是最容易研究的。历史大多书写的是王侯将相，由于底层留下来的资料很少，历史学家很难研究和重构底层老百姓的生活。最顶层也很少人研究，除了资料难以获得以外，高层活动的隐蔽性和复杂性也是一个原因。

正如阿瑞吉经常引用的布罗代尔的《15 世纪至 18 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第 3 卷中的话（金融扩张的概念其实就是来自布罗代尔），某个周期下的资本主义一俟进入金融扩张的阶段，就宣告进入了发展的成熟期，是进入秋天的迹象。布罗代尔通过对意大利、荷兰和英国的研究，总结出按照资本积累周期的不同方式，资本主义发展先要经历物质扩张阶段，再经历金融扩张阶段，而金融扩张是该周期之下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终结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加快了金融扩张，阿瑞吉据此推断，这意味着美国霸权在此时已迈向了下坡路。

阿瑞吉对布罗代尔的历史思想进行了发展。在布罗代尔看来，从 14 世纪、15 世纪到 20 世纪，金融扩张似乎是一成不变的，阿瑞吉则认为，金融扩张不是简单的重复出现，金融扩张的时候都是历史的大变革期（Arrighi & Cleary, 2009: 125）。

阿瑞吉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积累和统治的模式，而不只是生产模式。只有在工业革命到来以后，资本主义才成为我们所理解的生产模式（Arrighi & Cleary, 2009: 137）。阿瑞吉和马克思、韦伯在观点上有诸多差异。韦伯认为，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中，不同国家竞相争取流动资本，这为国家掌握权力提供了条件。阿瑞吉完全同意争夺流动资本的重要性，但他还认为权力集中于政府和商业机构的特定集

团之手，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不断重现的物质扩张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在主导集团获取充分权力，让国家之间的竞争处于控制之中并保持最低程度的国家间合作的情况下，物质扩张才有可能出现（Arrighi, 1994: 12）。马克思发现，中世纪晚期热那亚和威尼斯所引领的国债制度在推动现代资本主义最初扩张中有重要作用。但马克思关注的仅是国内的资本积累，没有发现在不断的国家竞争中，国家为了追逐权力，需要寻求资本家的帮助，而国债在这个过程中也起到重大作用（Arrighi, 1994: 12）。

阿瑞吉吸收了布罗代尔的大部分观点，并在《漫长的 20 世纪》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20 世纪末所出现的金融扩张是全球经济的特点，但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历史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重复出现的趋势。第二，金融扩张不只是一再重复的现象，还是积累体制进行完全重组的时刻。第三，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动力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而且让 20 世纪末的金融扩张在一些关键方面成为异常现象。最关键的异常现象在于金融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的分开（Arrighi, 2010: 371 – 372）。美国掌握军事权力，东亚地区掌握经济权力。

（三）资本积累的四个系统周期

阿瑞吉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还体现在他的“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理论（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

马克思曾提出著名的资本的一般公式： MCM' 。 M 是货币资本， C 是商品资本， M' 代表扩大的流动性、灵活性和选择自由（Arrighi, 1994: 5）。阿瑞吉在第二章《资本的崛起》对此公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从 M 到 C 是资本积累的过程，金融扩张则是指从 C 到 M' 的过程，即资本的借贷和投机。在物质扩张时期，货币资本让大量商品“动起来”；在金融扩张时期，货币资本从商品形式中“解放出来”，并通过金融交易的方式进行积累（用马克思的公式，就是直接从 M 到 M' ）。这个阶段构成完整的积累的系统周期（ MCM' ）。

阿瑞吉认为，最早的资本积累的网络是完全嵌入并从属于权力网络的。为了追求利润，商业组织必须成为强大的国家。比如意大利北部的资本家寡头统治，他们不但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成为领导者，在国家建构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也成为领导者。但随着资本积累网络扩张至全球，资本积累逐渐变得具有自主性，并成为权力网络的支配者。为了追求权力，政府不但要在国家建构和发动战争的过程中成为领导者，而且还需要成为资本积累的领导者。权力网络反过来嵌入，并从属于资本积

累的网络之中（Arrighi, 1994: 86）。

阿瑞吉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最初是嵌入城邦体系之中的，而从资本主义的城邦时期转变到民族国家时期要经历好几个世纪。在霸权转移中，先是城邦（最有名的是威尼斯）和源于城邦的海外商人群体（最有名的是热那亚），然后是结合了城邦和民族国家特点的荷兰，最后才是成为民族国家的英国和美国（Arrighi, 2002: 13）。

按照“积累的系统周期”，阿瑞吉区分出了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系统周期。第一个周期是热那亚。在1454年，意大利百年战争结束以后，小城市失去独立地位，意大利形成四个主要城市：佛罗伦萨、热那亚、米兰和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开始新的国家建构，三座城市的精英开始“贵族化”，注重城市的防卫，成为领地国家，也逐渐失去在欧洲舞台的重要地位。热那亚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发展出了金融资本主义^①，并与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热那亚将意大利北部过剩的资本提供给卡斯蒂利亚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则为热那亚开拓新的贸易空间。在16世纪，形成三角流动空间：白银从美洲运至塞尔维亚，在热那亚兑换成黄金和汇票，再转给在安特卫普作战的西班牙军队（Taylor, 2007: 144）。

热那亚、荷兰、英国和美国四个系统周期之间具有极大的差异。在热那亚海外商人群体的积累的系统周期中，主要是对伊比利亚半岛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施加金融影响力。在荷兰的积累的系统周期中，是将保护成本内部化，由金融资本家来控制和利用荷兰这个国家。在英国的积累的系统周期中，是将生产成本内部化，将原材料生产置于整个大英帝国的边界之内。在美国的积累的系统周期中，则是通过跨国公司的扩张，将交易成本内部化。至于未来的东亚的积累的系统周期，则是灵活积累和外包（Robinson, 2011: 273）。

阿瑞吉划分出了信号危机和终结危机。信号危机是指从贸易和生产转变到金融中介和投机。阿瑞吉将“漫长的15、16世纪”划分为14世纪40年代(s_0)到热那亚时代的结束(t_1)，大概有290年。“漫长的17世纪”划为从1560年前后开始的热那亚体制的信号危机(s_1)到18世纪80年代的荷兰体制的终结危机，大概有220

^① 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具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派认为帝国主义本质是垄断资本主义，一派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前一派以德国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为代表，俄国革命家列宁将希法亭的观点据以为真，从而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错误判断。后一派以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为代表。阿瑞吉持后一派观点。

年 (t_2)。没有“漫长的 18 世纪”。“漫长的 19 世纪”为从 1740 年前后开始的荷兰体制的信号危机 (s_2) 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体制的终结危机 (t_3)，“仅有” 190 年 (Arrighi, 1994: 216)。美国体制的信号危机 (s_4) 已经出现，但“漫长的 20 世纪”还没有终结。

虽然阿瑞吉在写该书时，美国社会学家亚历山德罗·波特斯尚未提出经济社会学的三大元假定 (Portes, 2010: 13)。但是，从该书的内容可以看出，该书恰恰体现了经济的社会嵌入、意图性行动的意料外后果、权力的无处不在这三大经济社会学元假定。书中写到意想外的后果有：荷兰出乎意料地控制了波罗的海的贸易 (Arrighi, 1994: 133)；东印度公司只想从事贸易，并不以占有领土为目的，但最终却占有了大量领土 (Arrighi, 1994: 156)；最大的意料外后果是霸权国家的金融扩张反而导致霸权国家走向衰落。在同一部作品中，要同时结合这三大元假定无疑需要极强的学术功力。

阿瑞吉的经济社会学分析也有局限，阿瑞吉关注的是处于世界体系上层的金融资本和国家，忽略了来自底层的阶级和社会力量。由于该书没有涉及阶级和劳工等内容，因此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阿瑞吉更关注深层的历史结构，忽略了行动者的能动性 (Robinson, 2011: 274 – 275)。阿瑞吉自己承认，在关注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周期性出现的同时，很难再同时处理劳工问题。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下有较大的变动，难以把握 (Arrighi, 2009: 74)。另外也有论者指出，他忽略了两大问题：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和争夺霸权国家之间的战争 (Chase-Dunn, 1996: 165)。但其实军事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阿瑞吉分析的核心，并未忽略战争的影响。

四、结语：理解阿瑞吉

在中国，谈论和译介阿瑞吉的大多是新左派学者 (阿尔利吉, 2000)，阿瑞吉的理论不受自由主义者待见。原因之一是晚年的阿瑞吉继续推演了资本积累的系统周期理论，认为现在早已进入资本积累的第四个、第五个系统周期的交叠，进而推断中国将崛起并取代美国的地位。因此阿瑞吉三部曲的第三部《亚当·斯密在北京》所引发的学术争议远超过前两部。

客观地说，阿瑞吉对中国历史和政治所知不深，但他却往往能够出人意表地抓住最为关键之处。兹举两点：第一，他认为中国重新崛起与历史上的“朝贡”贸易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是中国能够走向复兴的历史基石。第二，他认为前现代和现代时期的中华帝国，相比于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说不上是显得更具理性，也说不上是更不具有理性。它奉行的是完全不同的逻辑（Arrighi, 1994: 36）。这段话出现在该书的第二章，看似费解，但如果读完全书，掌握了阿瑞吉的分析逻辑，再返过头来阅读，无疑会觉得无比清晰。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形成往往是暴力扩张的过程，毫无确定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边界。这是无理性，也是非理性的，纯粹只是出于本能而进行战争和征服（Arrighi, 1994: 36）。阿瑞吉则认为中华帝国是一个例外，他称中国奉行领土主义的权力逻辑。这种逻辑将权力等同于统治区的面积和人口，资本只是追求领土扩张过程中的手段或副产品。与之对应的另一种逻辑是资本主义的权力逻辑，它将权力等同于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占领领土只是资本积累的手段和副产品（Arrighi, 1994: 33）。英国在18世纪将这两种逻辑整合为一，从而成为取代荷兰的新霸权，阿瑞吉称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Arrighi, 1994: 54）。

阿瑞吉并不认为全部的市场过程（包括贸易、商业、劳动移民、技术转移和信息流动）都遵循资本主义逻辑，并被资本主义逻辑所驱动（Arrighi, 2007: 212）。问题在于，阿瑞吉认为美国奉行的主要也是资本主义逻辑，中国奉行的是另外一种逻辑。但这两种逻辑及其导致的后果有何区别？阿瑞吉并不讳言由于金融扩张和赤字融资，中国存在财政危机的风险（Arrighi, 2007: 220）。中国的崛起及中美摩擦（近期以贸易摩擦为表征）在一定意义上符合阿瑞吉的理论解释，也证明了阿瑞吉的先见之明。美国和中国都存在金融扩张，只是处在金融扩张的不同阶段。阿瑞吉只能解释即将被取代的美国处在金融扩张的晚期，但无法解释正在崛起的中国为何会过早进入金融扩张，这是阿瑞吉理论的一个盲点。

阿瑞吉认为当下的霸权转移最突出的特点是经济权力与军事权力的脱离。经济权力由东亚地区掌握，美国则掌握军事权力。但阿瑞吉忽略了美国军事霸权处在严重的衰败过程中，美国所掌握的军事权力并不牢固。阿瑞吉所指的东亚主要是指日本和中国，他将1500年至2003年的日本和中国的GDP总和、人均GDP与美国和英国进行对比（Arrighi, 2007: 38），隐含的意思是中日关系相当于英美关系。他没有将中日背后的历史恩怨纳入考虑。他认为，经济是东亚国家间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利益重于民族主义情绪，经济主导一切（Arrighi, 2009: 89–90）。同时，以中日两国经济总量的简单加总来衡量东亚的经济实力存在着不小的问题。

经济周期（包括经济扩张与阶级衰退）本来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产物，理论解释并不鲜见。但能够将 20 世纪的金融扩张与各国历史上的经济波动联系起来，考察其异同，并由此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展开社会学分析，阿瑞吉的思想极具创新性。中国是否会取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不是阅读阿瑞吉的目的。理解阿瑞吉的分析逻辑和他对新经济社会学的批评，才是至关重要的。阿瑞吉重拾旧经济社会学注重宏观和历史分析的优良传统，矫正了新经济社会学过于微观和琐细的研究取向，恢复了对资本主义、金融化等重大议题的关注，从系统和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释。

参考文献：

- 阿尔利吉，乔凡尼，2000，《历史视野中的劳动力供给》，载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阿瑞吉，乔万尼、贝弗里·西尔弗，2006，《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北京：三联书店。
- 阿里吉，乔万尼，2009，《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戴雪丽，2014，《试析阿瑞吉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理论》，《学术探索》第 1 期。
- 李博，2016，《体系积累周期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历史及其延续》，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王荣欣，2014，《资本推手：国际劳工运动的发展与变迁》，《社会发展研究》第 1 期。
- 杨典，2018，《公司的再造：金融市场与中国企业的现代转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Arrighi, G. 1994,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Verso.
- 1998, “Capitalism and the Modern World-System: Rethinking the Nondebates of the 1970's.”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21 (1).
- 2001, “Braudel, Capitalism, and the New Economic Sociology.” *Review (Fernand Braudel Center)* 24 (1).
- 2002, “Lineages of Empir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0 (3).
- 2007,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 Verso.
- 2009, “The Winding Path of Capital.” *New Left Review* 56.
- 2010,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Verso.
- Arrighi, G. & J. Cleary 2009, “Up for Grabs.” *Field Day Review* 5.
- Chase-Dunn, C. 1996, “History and System: The Whole World.” *Contemporary Sociology* 25 (2).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 Hardiman, M. & J. Midgley 1982,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USA: John Wiley & Sons Ltd.

- Krippner, G. 2012, *Capitalizing on Crisi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Rise of Fina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ortes, A. 2010,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Robinson, W. I. 2011, “Arrighi Giovanni: Systemic Cycles of Accumulation,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the Rise of China.” *New Political Economy* 16 (2).
- Silver, B.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wedberg, R. 1991, “Major Traditions of Economic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7.
- Taylor, P. J. 2007, “Problematizing City/State Relations: Towards a Geo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Contemporary Globalizatio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New Series* 32 (2).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法学院

责任编辑：张书琬

更正说明

本刊 2019 年第 1 期《治理如何“运动”起来？——多重逻辑视角下的运动式治理与地方政府行为》第 136 页图 1 更改为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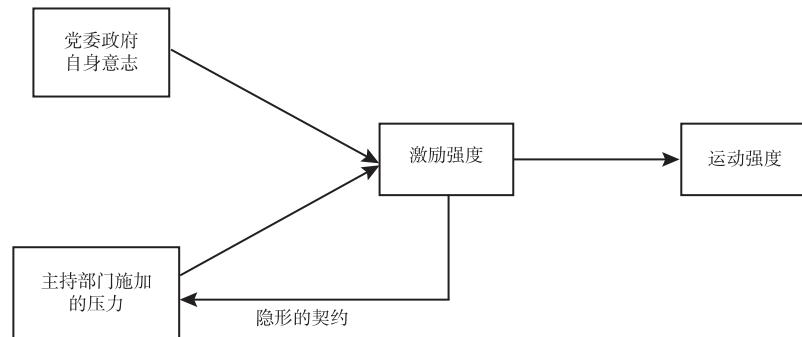


图 1 运动式治理的强度

特此说明。

《社会发展研究》编辑部

2019 年 5 月